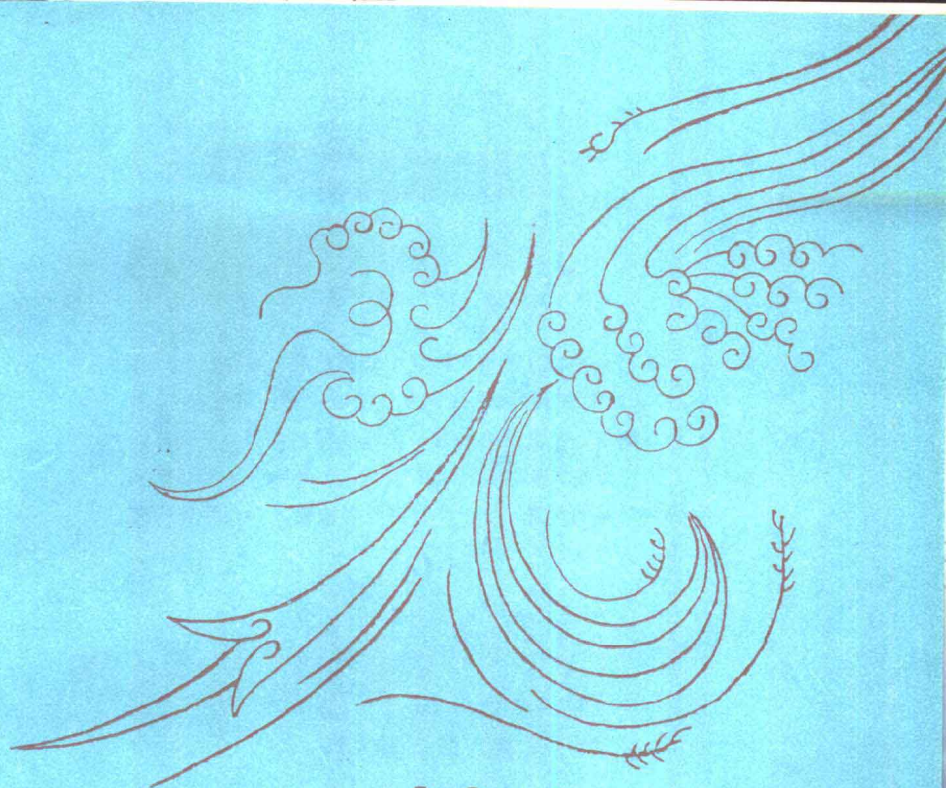


楚辞集解

〔明〕汪瑗
董洪利 点校 撰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横波乘水车兮
荷盖驾两龙兮騞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
兮浩荡日将暮兮悵忘归惟极浦兮寤怀鱼
鳞屋兮龙堂紫贝阁兮朱宫灵何为兮水中
乘白龙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诸流渐兮
兮将来下兮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
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腰予



楚辞集解

北京古籍出版社

〔明〕汪瑗 撰
董洪利 点校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明代《楚辞》研究中质量最高、最有特色的注本。作者眼界较为开阔，在全面分析屈原思想的基础上，敢于驳正旧说，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和观点。注释详尽，语言流畅，务尽其说，不留难点，解决了不少悬而未决的屈学疑难问题。据日本上野图书馆藏本并考核国内藏本点校。

楚 辞 集 解

CHUCI JIJIB

〔明〕汪瑗撰 董洪利点校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朝阳新源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47 000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2 001—5 000

ISBN7-5300-0083-7/I·3

定价：16.00元

点校说明

《楚辞集解》是明代《楚辞》注本中质量较高、较有特色的一部著作。

作者汪瑗，字玉卿，安徽歙县人。由于材料缺乏，他的生平事迹很难考证翔实，只能根据一些零散记载言其大概。汪瑗的主要活动时期大约是明嘉靖年间。据焦竑序说，他为《楚辞集解》作序时，汪瑗已经“逝之五十年”。焦序作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则汪瑗的卒年当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汪瑗之子汪文英在《天问注跋》中说，他“甫离襁褓”时其父就“中道摧折”了。据此，则汪瑗卒时大约只有四五十岁。所以汪瑗的主要活动时期当是嘉靖年间。

汪瑗幼时聪颖好学，治经之余，饱读了家中各类藏书。后与其弟汪珂同去苏州一带求学。兄弟二人曾同学于明代著名学者归有光门下，受到归有光的称赞^①。还在求学之际，兄弟二人就已名噪三吴，时人常把汪氏昆仲比作历史上著名的丁仪、丁廙或陆机、陆云兄弟^②。在归有光门下游学三年返回家乡之后，汪氏兄弟一边从事著述，一边向家乡士子传授古文辞，但这些活动却受到汪瑗父亲的极力反对。结果汪珂弃文从商，“挟篋而贾游”。汪瑗被迫“屈首经艺”，用功数年，学有所成，屡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正当要“期以经艺显”的时候，又不幸中

① 归有光《序》：“余碌碌薄才，端章甫衣之士相从者何下数百人，未有如玉卿昆季者。”

② 归有光《序》：“三吴有双丁二陆之称，非凡士也。”

年身亡。

汪瑗生前“恬淡自修，不慕浮艳，优游自适，无意功名，以著述为心”^①。他的著作有李白、杜甫诗注，《庄子注》，《楚辞集解》和《巽麓草堂诗集》等，而现存的大概只有《楚辞集解》和《杜律五言补注》两种了。

《楚辞集解》大概成书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归有光是年曾为此书作序。书成之后，并未立即刊行。汪瑗死后，家人曾一度准备刻印，却又不知何故中途而废。又过了数十年，汪氏家族日益衰落，为维持生计，“家人挈藏书以售之”^②，汪瑗之侄汪仲弘闻知，“藉他手倍值以购”^③，才使《楚辞集解》得以保全，未至湮灭。

《楚辞集解》的版本今所能见到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刊本，一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刊本。四十三年刊本是汪瑗之子汪文英出资刊刻的。此本有焦竑序、汪文英《天问注跋》、《楚辞》大小序^④、《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异》一卷。《天问》部分没有汪瑗的完整注文，只刻印了汪瑗附于朱熹《天问集注》上的眉批。按归有光序说：“至于《天问》，聚丝攒锦，纶绪分之，一目而领其概，再目而得其详，读之令人一唱三叹。”可见汪瑗原书确有完整的《天问》注。刊本《天问》注之缺，据汪文英跋说是因为原稿被“近属辈所藏匿”，而“从之祈求，不啻再三，卒匿其稿，不付剞劂”，只好把汪瑗当初读朱熹《楚辞集注》所做的眉批付刻，“使读者因一斑而窥全豹”。

四十三年本刊行后，汪瑗之侄汪仲弘有感于《天问》注之缺，“欲补其全”，经过三年努力，完成了《天问补注》。汪文英之子汪麟又从败篋中搜寻出归有光在嘉靖二十七年写的序和汪

① 见归有光《序》。

②③ 见汪仲弘《楚辞集解补纪》。

④ 《楚辞大序》是汪瑗辑录的前人有关《楚辞》的总论和序文，《楚辞小序》是汪瑗辑录的前人对《楚辞》各篇的评论和题解。

瑗的自序交给汪仲弘。汪仲弘在万历四十三年刊本的基础上抽掉了汪瑗的天问眉批，又补刻了归有光序、汪瑗自序、汪仲弘自己所作的《楚辞集解补纪由》和《天问补注》，合为一书。这就是万历四十六年刊本。这个本子北京图书馆和日本上野图书馆均有藏本。笔者在比勘中发现万历四十三年刊本和万历四十六年刊本的绝大部分的版式、字体完全相同，因此万历四十六年刊本可能采用的是万历四十三年本的原版，仅在内容上略有增删。

《楚辞集解》刊行以后，曾对《楚辞》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清代乾隆以后，此书的影响就日见其微，流传也愈来愈少。这与《四库提要》对此书所做的不太公正的评价有很大关系。《四库提要》说：“《楚辞》一书，文重义隐，寄托遥深，自汉以来，训诂或有异同，而大旨不相违舛。瑗乃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怀故都一语为《离骚》之纲领，谓实有去楚之志，而深辟洪兴祖等谓原惓惓宗国之非。又谓原为圣人之徒，必不肯自投于水，而痛斥司马迁以下诸家言死于汨罗之诬。盖掇拾王安石《闻吕望之解舟诗》李壁注中语也。亦可为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矣。”

这段评论全盘否定了《楚辞集解》，失之公允。诚然，此书的确有《四库提要》所批评的某些错误观点。如说屈原是圣人之徒，必不肯投水而死，因而得出屈原是隐遁而去的结论；又如汪氏以“何必怀乎故宇”一句为《离骚》的总纲，反复申说屈原确有去楚之志等等，这些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四库提要》对这些观点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但《四库提要》进而又把全书说得毫无价值，这就不符合事实了。

下面我们具体谈谈《楚辞集解》的特点及其价值。

《楚辞集解》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驳正旧说，不受传统或名家见解的束缚，对前代的《楚辞》名注，如王逸《章句》、

洪兴祖《补注》及朱熹《集注》都有所批评。这些批评无论正确与否，就其做法和态度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本来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况且，历史上的《楚辞》注中也有确有不少错误甚至荒谬的说法有待于后人不断地订正。但是《四库提要》的编者却认定《楚辞》注“自汉以来，训诂或有异同，而大旨不相违舛”，因此对汪瑗勇于创新不能容忍，斥之为“以臆测之见”排诋诸家，这个评价不是实事求是的。相比之下，倒是焦竑序的评价比较客观：“余窃观其书，殆有意错综诸家而折衷之，非苟然也。今读之，有同于昔谈者，非强同也，理自不得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好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当然，汪瑗不同于前代注家的创说并不都是正确的，但他敢于对相传既久的历史成说提出质疑，敢于摆脱传统观点进行认真的思考，这点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

《楚辞集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详尽。汪瑗自序说：“宁为详，毋为简，宁芜而未剪，毋缺而未周。务令昭然无晦，卓然有征，以无失扶抑邪正之意。”汪瑗严格遵循了这个原则，注释中力求把每个字句都讲得清清楚楚，从不避重就轻，不留难点。他的体例是先解释句中语词，再串讲章句大义。《楚辞》各篇重出的语词很多，凡重出的地方他都不惮其烦地一一加以详尽的解说，这虽有琐屑之嫌，却无疑给读者提供了较大方便。他串讲大义，善于把《楚辞》各篇的有关章节联系起来分析，使读者能从整体上把握屈原的思想和行事。

说到汪瑗注的价值，仍要回过头来讲他的创说，以及这些创说对后世《楚辞》注家的启发作用。因为汪瑗比较注意从总体上，从各方面的联系入手来分析屈原作品，所以他的注释眼界比较开阔，往往能够说出一些前人没有想到的观点。例如《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的“三后”，汪瑗以前的注家或解释为“禹、汤、文王”，或解释为“少昊、颡顼、高辛”三皇，这是依照儒家

道统说和法先王思想而作出的解释。汪瑗没有从这个角度解释，他分析了此句上下文义及屈原的思想脉络之后，认为三后当指楚国的三位先君“祝融、鬻熊、熊绎”，并且认为只有这种解释才符合屈原的立言之序。这个说法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既新鲜又合情入理的解释。又如“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落英”，孙奕、吴仁杰等人（见《示儿篇》及《离骚草木疏》等）囿于秋菊不落之成见，并不详察此句的上下文义，就主观地把“落”训为“始”，把“落英”解释为“始开之花”，同时又引经据典地加以证明。“落”可以训为“始”，但在《离骚》此句中很难讲通。此后的不少研究者都很欣赏这一说法，纷纷引申发挥。汪瑗则没有人云亦云，他批评了此说之后，又从文义和情理出发，作出了平正通达的解释：“夫落者不必自落而后谓之落，采而取之，脱于其枝，即可谓之落；如取露于木兰之上，亦可谓之坠也，若果谓坠之于地，则露岂可饮乎？”

诸如此类的说法，在汪瑗注中是很多的。他那些较为新鲜的创说，对清代前期的《楚辞》研究影响很大。一些著名的《楚辞》学者都曾引用过汪瑗的观点，并从中受到启发，研究出了新的成果。然而由于《四库提要》的不公正评价，《楚辞集解》逐渐被淡忘了，汪瑗的创说也都被误认为别人的观点，真正的发明者反倒鲜为人知了。

业师金开诚先生有感于此，曾专门著文为《楚辞集解》鸣不平（见《文史》第十九辑《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文中举了一些例子，都是被误解为别人观点的汪瑗创说。例如汪氏认为“湘君”、“湘夫人”是一对配偶神，此说被闵齐华《文选淪注》所采用，后世研究者因此而误认为“二湘”为配偶神之说肇自闵氏。又如关于《九章·哀郢》的创作背景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的说法，近世研究者几乎都认为是王夫之的创说，而实际上是汪瑗早已发表的观点。王夫之的另一著名成说是认

为《九歌·礼魂》是前十篇的送神曲，这实际上也是变用汪瑗之说，因为汪瑗早已指出“此篇乃前十篇之乱辞，故总以《礼魂》题之。”这些都是在《楚辞》研究界很有影响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到，《楚辞集解》确实极富参考价值。

这次整理以日本上野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参校了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四十六年刊本。但此二本无汪瑗的《天问》眉批，整理时从万历四十三年本录出，删掉了朱熹的《天问》注，又依《楚辞集解》之例把汪瑗之说分属于《天问》原文的各句之下，总称之为《天问注（辑录）》，附于书末，以备参考。又万历四十六年刊本有汪仲弘《天问补注》二卷，体例和风格与汪瑗《集解》均不同，内容也与汪瑗《天问》眉批不合，不宜载在汪瑗《集解》中，因此抽出，拟另行整理。此外，对汪瑗所引诸说，大部分都校以原书，纠正了讹误。

限于校点者的学术水平，此书的校点和其他各方面一定有不少错误，企盼读者有以海正。在整理过程中，开诚师曾予以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北京出版社的李树青先生精心审定原文，纠正了不少错误，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精力。谨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董洪利 1992年11月

目 录

楚辞集解序·····	〔明〕归有光(1)
楚辞集解序·····	〔明〕焦竑(3)
自序·····	〔明〕汪瑗(4)
楚辞集解补纪由·····	〔明〕汪仲弘(6)
天问注跋·····	〔明〕汪文英(8)

楚辞大序·····	(9)
楚辞小序·····	(20)
离骚·····	(35)
九歌·····	(108)
东皇太一·····	(109)
云中君·····	(112)
湘君·····	(115)
湘夫人·····	(119)
大司命·····	(123)
少司命·····	(126)
东君·····	(130)
河伯·····	(134)
山鬼·····	(137)
国殇·····	(141)
礼魂·····	(144)
九章·····	(146)

惜诵	(146)
涉江	(162)
哀郢	(171)
抽思	(182)
怀沙	(193)
思美人	(205)
惜往日	(213)
桔頌	(227)
悲回风	(233)
远游	(254)
卜居	(277)
渔父	(285)
楚辞蒙引	(291)
楚辞考异	(439)
附：天问注(辑录)	(453)

楚辞集解序

〔明〕归有光

新安汪玉卿者，平生博雅，攻古文辞，恬淡自修，不慕浮艳，优游自适，无意功名，以著述为心，与其弟鸣卿，偕游余门。三吴有双丁二陆之称，非凡士也。余碌碌溷才，端章甫衣之士相从者，何只数百人，未有如玉卿昆季者。玉卿丰姿奇俊，迥异寻常，超然有尘世想。幼厌青云事，游庠三年，飘然谢去，杜门却扫，不与物接，志存著述。一日涉桐江，渡钱塘，来谓曰：“爰今妄意抒辞，注释《离骚》。校讎之责，则余弟珂任之。删定当否，愿先生政之。”余喟然叹曰：“子天才也。精五经，通六艺，能歌诗古文辞。注李、杜、《南华》，又注《离骚》。此非大涵养非大识力者畴能及，余当退舍以让矣。”第载籍之士，每托青云，余屈于时而未达，岂足为玉卿轻重耶？玉卿之才又岂藉青云从干时好耶？今观《离骚》之注，发人之所未发，悟人之所未悟，发以辩理，悟以证心，千载隐衷，籍玉卿一朝而昭著。倚欤盛美，人谁得而间之？至于《天问》，聚丝赞锦，纶绪分之，一目而领其概，再目而得其详，读之令人一唱三叹。原何幸而得兹也。使九泉无知则可，九泉有知，当心服矣。虽然，士以名贵，名以才章，名显于一时，才施于后世。余不才，仅叨贤书而尤待年。才如玉卿，何愧于庙廊，何羞于缙绅，竟不能脱其颖，天行使余两人主此极，玉卿不能为余解，余更不能为玉卿解也。是集行。当如日月之明，光被四表，连城之璧，见重当时。匪惟重其弟鸣卿，且以重余。无青

云白社，轻重宁有定乎？览《离骚》亦知扬者非私心，而作者有蓄学也。余安得不发一辞而休扬之。是为序。

嘉靖戊申中七月既望昆山归有光熙甫于畏垒轩中。

楚辞集解序

〔明〕焦 竑

余尝谓古书无所因袭，独由创造者有三：《庄子》、《离骚》、《史记》也。《离骚》惊采绝艳，独步古今，其奥雅宏深，有难遽测。自昔溯风而入味，沿波而得奇者，虽间有之，未有能窥其藩者也。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楚辞传》，旦受命，食时而奏。意特离析篇段，便于披诵云耳。嗣是班固、贾逵间有论著，今辄不传。王逸始注《楚词》十七卷。嗣是洪兴祖、晁无咎、周少隐、林应辰、黄长睿莫不各有论撰，而莫备于朱子之书，读者皆知尊用之。然原词譎怪奇诡，非逸章决句断，未可易读，况诸家之说传自汉人，往往参于其中，盖有未可芻废者。新安汪君玉卿，少好词赋，流览既多，洞其得失，勒为此编。核者存之，谬者去之，未备者补之。或有援据失真，词意未愜，即出自大儒，不难为之是正。至于名物字句，不惮猥细，一一详究，目之曰《蒙引》。诚艺苑之功人，楚声之先导已。君既逝之五十年，子文英欲梓行之，以公同好，而属余为弁。余窃观其书，殆有意错综诸家而折衷之，非苟然者。今读之，有同于昔谈者，非强同也，理自不得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好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在学者善会之而已。君博雅多通，饶于著述，此特其一班云。

万历乙卯春日澹园老人焦竑书。

自序

〔明〕汪 瑗

余昔闻邪正消长之说，每慨正者之不能胜邪，今读《离骚》而益致感焉。屈原被谗，千古同恨。阅其辞，会其意，想其当日忧伤之情，令人涕泗沾襟，掩卷太息而莫能已者。夫《楚辞》为辞赋之祖。司马、班、杨，汉士词赋之雄也，逊美若不及，甚至推《骚》为经，是岂浅鲜者所能窥其藩乎。唐人惟柳子厚颇得《骚》学，退之、李观咸所未工。东方朔诸人《七谏》、《九怀》，不足为《骚》拟。遯哉《骚》义无穷也。严沧浪云：“《楚辞》惟屈宋诸篇当读之，外此则长沙《惜誓》、淮南王《招隐操》、庄忌《哀时命》等章，或宜展诵，其它不必也。”若然，是《骚经》为原绝唱。原何以获是奇抱于湘楚间哉？盖楚山川奇，草木奇，故原人奇、志奇又文奇，发乎辞章，复立千古，沿规袭武，无能仿佛其片言。汉兴，去古未远，武帝召汉茂才修《楚辞》，大山、小山竟不一企，何敢续《骚》？呜呼！《诗》亡矣，《春秋》不作矣，《骚》亦不可再矣。瑗独不能忘情于《骚》者，非独以原可悲也，亦惟悲夫《骚》不及一遇尼山耳。使《骚》在删《诗》时，圣人能遗之乎？《诗》不列楚风，而《鲁论》载楚歌，《汝坟》《江汉》之章与《二南》并纪，后世崇《骚》为经，有以也。瑗今妄意抒辞，尊经而遗传，岂敢确为定论，又岂敢与王、朱等注衡哉？其有洞而无疑者，则从而尊之；有隐而未耀者，则从而阐之；有诸家之论互为异同者，俾余弟珂博为搜采，余以己意断之。宁为详，毋为简。宁芜而未剪，毋缺而未周。务令昭然无晦，卓然有征，

以无失扶抑邪正之意，庶可以得原之情于万一乎。虽然，《离骚》之篇明而达，《九歌》之篇简而洁，《天问》之篇博而瞻，《九章》诸篇通而畅，《远游》、《卜居》、《渔父》诸篇或奇伟，或浑雄，或冲淡，尤不可以一律拘。体制虽殊，旨归则一。其文奇，而释之者固无所用其奇也。藉遇尼父，采附国风，毋论以奇删者，当亦不少。删则散轶，余又安能获睹其全而注之耶？余窃幸矣。而沧浪《答吴景山书》又有云：“所论《离骚》，中有深得，实前辈之所未发”。余注固知无当，不知于当时景山注且奚若也。呜呼，叔师一笺，滕发万古。今读《骚》者，率祧叔师而躋考亭。矧兹以述为作，又安敢景山埒也。亦惟自致扶抑之意，以为不得志于时者悼耳。裁成品定，是惟览者辨之。

新都玉卿汪瑗自叙于东山精舍。

楚词集解补纪由

〔明〕汪仲弘

嗟乎！先人遗书保护之难也，言之而泪潜焉。先人往矣，手遗编而緬口泽，倏然若将见之，情宜用愉快也。第先世之书，全而阙，阙而亡，倏丧倏获，而戚反缘以滋者。新都以文学世其家，则余宗著。余宗居丛山有年矣。一祖三宗鼎峙，若屈、昭、景。里中素封相望，冠盖如云。余属积衰，滕薛不得与诸任，齿微也。当先王父时，囊橐稍饶，首以《诗》《书》为吾宗扫云陆。大父承先志，凡古图书经传，不靳倾资蓄之。伯父爱幼而颖，治经余暇，肆其力于藏书，弗令大父知也。毗陵震泽，时以经术擅海内，大父饰羔雁，俾从之游。先君少伯父十龄，奋志偕适，就学数载，经史辞章靡不诣极，而尤专精于《楚词》。注释数十万言，其义伯实主之，冥搜博采，则先人之功倍焉。学就而返，都人士罔不心倾，日从学诗古文辞。大父始知伯父向者以诗古文辞学也。言且卒，先君因挟篋而贾游。伯父屈首经艺，试数冠诸生。方期以经艺显，风木不俟，蓼莪悲深，闭户嚶嚶，文光掩耀。伯兄能读父书，天靳其齿。仲若季富于齿，不能读父书。所注《楚词》，慢藏阙失，既无以慰先灵，登木未几，率尔唐捐，又令人私之蔡帐，行道用恻。矧余犹子，雅慕前修，可当吾世坐失家珍乎？因竭愚蒙赎而补辑。力小任重，自知丛取世訾，然责有莫逃，而颠未有当纪以减者。忆昔伯父之注《楚词》也，呕心为之。先君从兄，共相卒業。第五之名虽不必减骠骑，书成而伯父之心力尽矣。哲人云